

“批判种族理论”与“父母权利”运动： 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社会围绕教育 问题的争论

王瑞芳

内容提要 随着政治极化的溢出效应不断向教育领域渗透,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在教育改革理念和政策上的分歧日益加剧,主要聚焦在两点:一是“批判种族理论”在历史教学中的争议,民主党拥抱多元文化主义,而共和党则坚守基于“美国例外论”的爱国主义教育;二是关于父母与政府在学校教育中的权力边界之争,共和党提倡扩大“父母权利”,民主党则视教育为超越个人权利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教育问题上的博弈,联邦与州、地方的权力冲突,以及利益集团的推动和最高法院的全面右转,加剧美国社会政治极化和分裂,不仅降低公共教育质量,还在宏观层面上对主流价值观构成挑战。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 美国 政治极化 教育改革 批判种族理论 父母权利 多元文化主义

* 王瑞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084)

** 本文曾在第十六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宣读,为国家社科基金专项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节大磊副教授、刘莲莲副教授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婉璐老师对本文的指导。文章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政治极化是当前美国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国内外学界高度关注的话题。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政治极化现象不断加剧，2016 年总统大选年已经达到“超级极化”的程度。^① 随着美国政治极化广度、深度和强度的持续扩张，以及特朗普在 2017 年就任总统、新冠疫情暴发等事件的冲击，政治极化衍生的溢出效应已经渗透到美国教育领域。^② 民主党一直被冠以“教育党”，在公立学校教育、为学校提供资金等议题上赢得了多数选民的信任。然而，自新冠疫情以来，民主党逐渐丧失在教育领域的优势地位。根据有关民调显示，43% 的潜在选民在教育问题上信任民主党，而 47% 的人更青睐共和党。^③ 教育曾经位于共和党优先事项靠后位置，近年来为了扩大选民基本盘，共和党正在加强对教育的主导和掌控。2021 年 11 月，共和党人格伦·扬肯 (Glenn Youngkin) 以“父母权利”(Parents' Rights) 为竞选口号，在弗吉尼亚州长选举中战胜民主党候选人特里·麦考利夫 (Terry McAuliffe)，成功将蓝州翻红，扭转了该州的左倾趋势。^④ 扬肯的当选凸显了共和党对教育议题的重视，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产生深刻影响，将教育问题推向美国政治前沿。^⑤ 政治极化对教育政策的影响是可见的、可证明的。回顾历史，教育领域曾经是两党合作的堡垒，主要的联邦教育法获得了两党的广泛支持，然而近些年来，两党在教育领域的合作降低，矛盾和冲突日益增长，难以重现 20 世纪 60、70 年代团结共进的教育“黄金时代”。

国内外学者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现象、原因、影响及能否去极化进行研究，

① Alan I. Abramowitz, *The Disappearing Center: Engaged Citizens, Polariz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4.

② Alia Wong, "Schools are Becoming Hotbeds of Political Conflict—Especially in Purple Districts," *USA Today*, November 30, 2022,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education/2022/11/30/political-conflict-increases-in-schools/10789797002/>, 2023-12-06.

③ Lauren Camera, "Democrats Cede 'Party of Education' Label to GOP: Poll," *U. S. News*, July 20, 2022, <https://www.usnews.com/news/education-news/articles/2022-07-20/democrats-cede-party-of-education-label-to-gop-poll>, 2023-12-03.

④ Maanvi Singh, "Republican Glenn Youngkin Wins Virginia Governor's Race in Blow to Biden," *The Guardian*, November 2, 20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1/nov/02/glenn-youngkin-wins-virginia-governor-election-result>, 2023-11-28.

⑤ Ledyard King and Mabinty Quarshie, "It's Not just Virginia. Education and Critical Race Theory Are on the Ballot across the US in 2022," *USA Today*, December 5, 2021,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21/12/05/republican-congress-path-suburban-parents/8667176002/?gnt-cfr=1>, 2023-09-20.

并取得一些成果。^① 研究发现,随着时空条件变化,政治极化呈现动态发展态势,而政治极化与教育之间相互作用,则是亟待深入研究领域之一。目前,学界在探讨社会文化与美国政治极化的关系时,对教育主题有所提及,^②但对政治极化与美国教育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比论证党争“入侵”美国教育领域,利用美国政府部门文件、民意调查机构数据库及智库报告等资料,采取案例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对三个问题进行分析:在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教育领域的分歧聚焦在哪些方面?引发教育问题争议的政治因素有哪些?政治极化对美国教育及社会发展产生何种影响?

一、民主、共和两党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历史与对立现状

历史上,虽然两党在教育问题上存在摩擦,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1世纪初,总体上是两党进行跨党派妥协、合力改善教育阶段。在特朗普就任后至拜登执政期间,美国校园沦为党争的“中心战场”^③,两党在教育议题上合作困难,冲突与对立不断增多。

(一) 相同的教育理念与国内外因素共同促进两党的教育合作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教育领域的合作深受教育理念和国内外因素的影响。

① 参见张业亮:《“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第7—31页;Geoffrey C. Layman, et al., “Party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9, 2006, pp. 83-110; 范勇鹏:《政治极化之源:美国制度中的党争基因》,《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22期,第72—87页;Morris P. Fiorina and Samuel J. Abram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1, 2008, pp. 563-588; 周琪:《政治极化正在溶蚀美国的民主》,《美国研究》2022年第2期,第9—34页;Nolan McCarty, et al.,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Cambridge: MIT Press, 2016; 付随鑫:《美国政治能够去极化吗?:基于美国历史经验和政治制度的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3期,第105—115页;James E. Campbell, *Polarized: Making Sense of a Divided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② 参见牛霞飞:《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政治极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1期,第29—55页;徐海娜、龙林坤:《拜登政府的激进社会文化政策及其国内博弈》,《当代美国评论》2023年第4期,第99—122页;翟迈云、李庆四:《为谁讲故事:美国两党的国家叙事之争》,《美国研究》2023年第3期,第91—114页;David M. Houston, “Polar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What Moves Partisan Opinion?” *Educational Policy*, Vol.35, No.4, 2019, pp. 567-568.

③ Ronald Brownstein, “Why Schools are Taking Center Stage in the Culture Wars,” CNN, February 15, 2022, <https://www.cnn.com/2022/02/15/politics/schools-covid-politics/index.html>, 2024-11-01.

美国人笃信教育的威力，相信教育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关键。^①从北美建立殖民地起，欧洲移民每踏上一片土地，必做两件事：一是修教堂，二是建学校。^②教育理念的一致性成为两党合作的思想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在冷战时期给美国带来的危机、民权运动时期美国国内社会问题的凸显，以及日本和联邦德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迅速崛起等内外部因素，推动两党在教育领域合作，从而形成推动美国教育改革的强大政治力量。两党合作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1958 年《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是冷战的产物，标志着两党在联邦教育领域合作的开始，彰显联邦政府积极参与全国教育事务的决心，并对美国教育史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大对峙阵营形成，进入冷战时期。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 1 号(Sputnik-1)，美国政府顿生强烈的危机感，将宇航技术发展的滞后归咎于国内教育未能培养出足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此前，参议院三次通过联邦教育资助法案，均遭众议院否决。“斯普特尼克(Sputnik)事件”后，美国社会强烈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促使参议院再次推进教育改革立法。为了减少众议院的阻力，参议员利斯特·希尔(Lister Hill)提议将教育法案命名为《国防教育法案》，该策略成为推动《国防教育法》顺利通过的关键因素之一。^③换言之，苏联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触发了战后美国两党合力改革教育的首次浪潮。^④

其次，20 世纪 60 年代，在民权运动和反贫困运动的浪潮中，“教育机会平等”成为为“反贫困之战”的重要工具。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党共同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家庭儿童的教育问题，致力于提高边缘人群的平等教育权。1964 年 1 月 8 日，约翰逊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向美国的贫困宣战”，强调“改善学校教育”是反贫困和构建“伟大社会”的“主要武器”之一。^⑤在“伟大社会”理念的

① 史静寰：《当代美国教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② 王定华：《走进美国的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 页。

③ United States Senate, “Sputnik Spurs Passage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https://www.senate.gov/artandhistory/history/minute/Sputnik_Spurs_Passage_of_National_Defense_Education_Act.htm, 2023-12-10.

④ 陈露茜等：《战后美国公共教育改革中的“变”与“不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123 页。

⑤ Lyndon B. Johnson,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in *Bernard L. Boutin Personal Papers*,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January 8, 1964, https://www.jfklibrary.org/asset-viewer/archives/blbpps-mf10-013#?image_identifier=BLBPP-MF10-013-p0001, 2023-12-11.

引导下,美国的教育政策开始着力消除种族隔离,通过补偿教育和特殊教育提升贫困家庭儿童的学业水平,帮助他们打破“贫困循环圈”。^①为此,约翰逊总统成立了白宫教育专项小组,负责研究并起草教育法案。1965年1月12日,他向国会提交了《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或《中小学教育法》,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草案,并呼吁“发展教育是当前美国人民的头等大事!”^②然而,该法案遭到大多数共和党人和部分南方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联邦资助教育违背宪法,会危及州和地方的教育主导权。在约翰逊政府的坚定支持和全美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等教育组织的积极游说下,该草案最终获得通过并于1965年4月11日正式签署,并获得各州的广泛支持。据统计,美国有94%的地方学区接受了联邦教育津贴。^③随后,国会陆续通过《双语教育法案》《教育修正法案》和《全体残障儿童教育法案》等,确保弱势群体和贫困家庭儿童享有接受免费、适当公共教育的权利。

再次,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联邦德国的迅速崛起,导致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经济发展遭遇挑战。来自国际因素的压力,迫使两党不仅致力于实现基础教育的公平性,还特别关注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当时,美国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期,生产力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因此,提升教育质量和增强公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成为当务之急。1983年,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发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 Reform)。该报告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公立中小学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和面临的严峻挑战,明确地指出国家摆脱危机的途径,以及提高教育质量和保证教育公平的重要性。民主、共和两党经过艰难磋商,最终达成两项重要的教育改革共识:(1)由联邦政府主导教育改革;(2)制定统一的国家教育标准。随后,老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分别于1991年和1994年签署全美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美国2000年教育目

^① 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教授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五个家庭:贫困文化中的墨西哥人个案研究》和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问题》著作中,“贫困循环圈”均有被及,其具体内涵是:穷人由于缺乏教育机会,教育水平低而影响其就业状况,进而导致了生活质量低下,无力为子女提供充足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使得贫困在代际间传递,形成恶性循环。

^② 傅林:《当代美国教育改革的社机制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

^③ Frank Baumgartner and Bryan Jones, eds., *Policy Dyna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 297.

标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其中，《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继承并发展了老布什政府制定的六项“国家教育目标”，为美国教育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①

最后，在“富有同情心保守主义”理念的引导下，小布什总统于2001年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该法案强制规定联邦政府对学生评估、课程设置和教师认证的标准。学校达到既定的教育标准后，可获得联邦额外资金；反之，将面临联邦教育拨款的削减。这被称为“自‘伟大社会’计划以来，联邦政府对中小学教育的最大干预”。^②《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获得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广泛支持，特别是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支持，这彰显了两党在教育改革议题上的“跨党派合作”，也表明两党认可联邦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干预作用。^③奥巴马总统时期，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用《每个学生都成功法》(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取代《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将教育的管理权由联邦下放到各州和地方。^④21世纪初，美国最重要的两部联邦教育法案均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这在政治生态复杂、党派斗争激烈的美国实属罕见。^⑤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1世纪初，联邦教育改革出现多次跨党派妥协与合作，主要的教育法案往往以高票数通过，获得两党的普遍赞同与支持。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10年代中期，民主、共和两党总统都战略性地采取了温和立场，以吸引中间选民并扩大他们的选举联盟。^⑥老布什总统和小布什总统均主张加强联邦政府在K-12教育中的作用，^⑦这与共和党一贯秉持的“小政

① Bruno V. Manno, “George H. W. Bush: The Education President,” The Thomas B. Fordham Institute, <https://fordhaminstitute.org/national/commentary/george-hw-bush-education-president>, 2023-10-20.

② 张业亮：《奥巴马执政以来的美国联邦权和州权冲突》，《美国研究》2015年第5期，第52页。

③ Jim Dueck, *Common Sense about Common Core: Overcoming Education's Politic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6, p. 27.

④ 王芳：《两党政治下美国教育政策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以新世纪以来教育改革政策为例》，《当代青年研究》2021年第4期，第112页。

⑤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以87:10和381:41在参众两院通过，H. R. 1 (107th):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votes/107-2001/h497>, 2024-10-03；《每个学生都成功法》以85:12和359:64在参众两院通过，Details for S. 1177 (114th):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4/s1177/details>, 2024-10-03.

⑥ Patrick J. McGuinn, *No Child Left Behi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ederal Education Policy, 1965-2005*,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⑦ 在美国，基础教育统称为“K-12”，其中“K”代表“kindergarten”，相当于中国的学前班，“12”代表12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三。

府”理念相悖。同样,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与奥巴马在“学校问责改革”和“学校选择”议题上则采取了中间或偏右的立场。克林顿和奥巴马总统的温和立场为跨党派的立法合作创造了条件。^①

(二) 社会“自由化”加速与保守势力反扑降低两党教育合作

2017年后,随着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社会“自由化”趋势加快,自由派大力推动进步主义议程导致保守派激烈反弹。特朗普政府的教育改革政策一改美国历届政府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传统,其核心理念是联邦政府减少对教育事务的直接干预,恢复州和地方对教育的主导权,主张废除“共同核心课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支持父母的教育选择权,并倡导在教育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等。为了反击共和党的右翼保守主义政策,延续民主党的政策传统,拜登政府批评白人至上主义,反对教育券进入私立学校,主张发展公立教育,确保所有学生都能接受优质的教育。新冠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催化了美国两党在教育政策立场分化,由此,两党在教育问题上的矛盾增多,合作日益困难。

在教育管理权归属方面,特朗普政府反对联邦层面统一的学术标准,主张废除“共同核心课程标准”,增强各州和地方办学的自主权和独立权。“共同核心课程标准”是美国标准化教育改革和教育国家化政策的具体体现,旨在为K-12学生制定全国统一的读写和数学能力课程教育标准。^②各州有权决定是否采纳“共同核心课程标准”,并在执行过程中享有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本州的教育需求和特点。2013年,两党多数成员都支持“共同核心课程标准”,到2014年,共和党人的支持率从57%下降至43%,民主党人的支持率则相对稳定,分别为64%和63%。^③鉴于“共同核心课程标准”是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发起的倡议,因此,共和党支持率的下降并不令人意外。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特朗普承诺废除“共同核心州立标准”,以迎合右翼选民的支持。他认为“共同核心课程标准”已经落伍,是一场教育灾难,不仅限制了学校教育质量和教学效率的提高,也违反了教育的初衷。

^① Jesse H. Rhodes, *An Education in Politics: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No Child Left Behi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26-133.

^②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https://corestandards.org/wp-content/uploads/2023/09/ELA_Standards1.pdf, 2023-09-14.

^③ Jim Dueck, *Common Sense about Common Core: Overcoming Education's Politics*, p. 22.

在高等教育领域,特朗普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肯定性行动计划”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时期,旨在改善少数族裔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在教育、就业等领域提供特殊照顾,以消除历史性系统性歧视,促进机会平等,推动社会公正和多元化。特朗普政府与克林顿、奥巴马政府在“肯定性行动计划”问题上政策存在显著差异。特朗普政府认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措施会给白人群体带来“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危害教育公正,因此,主张大学应遵循自由竞争、择优录取原则,不应降低录取标准以照顾特定少数族裔群体。^①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2020年,黑人学生获得学士学位的比例为27.8%,而1970年低于5%;1990—2020年间,白人与黑人大学新生人数比例差距也从10%缩减到不足5%。^② 一些美国人认为,以种族为基础的优先待遇是一项极不公正的政策,与美国主流价值观念和人人机会均等的社会理念背道而驰。^③ 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正是自认为“肯定性行动计划”最大的受害者将特朗普送上了总统宝座。^④

在基础教育领域,特朗普政府倡导以自由竞争为核心,鼓励“自由择校”,发展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增强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力,从而促进美国教育的良性发展。面对各州和学区之间因办学经费不均导致的教育不平等,特朗普政府视“自由择校”为关键解决方案,鼓励家长将私立学校、特许学校等作为对公立学校系统的替代选择。为了进一步推动“自由择校”政策的实施,特朗普政府提倡将“自由择校”与“教育券”相结合,并提出200亿美元的教育券计划,允许学生将联邦教育资金用于选择公立或私立学校,旨在为贫困学生创造更多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⑤ 特朗普政府的“自由择校”计划较于其他总统的政策更具革命性,择校的范围更大、机会更多,通过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促进学校间的竞争,激励公立学校提升教育质量留住学生。

① Andrew O'Reilly,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Breaking from Obama-era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Fox News, July 3, 2018,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trump-administration-is-breaking-from-obama-era-affirmative-action-policies>, 2023-12-20.

② "Post 5: Racial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and Attainment," 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June 9, 2023,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featured-stories/post-5-racial-differences-in-educational-experiences-and-attainment>, 2023-10-01.

③ 朱世达:《克林顿政府在肯定性行动中的两难处境》,《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第73页。

④ 周顺:《美国平权运动及其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史学月刊》2021年第9期,第103页。

⑤ Yamiche Alcindor, "Trump's Call for School Vouchers is a Return to a Campaign Pledge," *New York Times*, March 1,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3/01/us/politics/trump-school-vouchers-campaign-pledge.html>, 2023-12-16.

拜登政府执政后,面对白人至上主义回潮、民主党建制派影响力下降的局面,他撤销了特朗普执政期间的部分教育改革政策,颁布了诸多激进的社会文化政策,强调联邦政府在保障教育机会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主张继续扩大政府在教育中的职能,提高教师待遇,建立统一的基础教育评价标准,确保学生在阅读、写作、数学和科学等关键学科上达到基本能力要求。2021年1月,拜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批评白人至上主义,撤销特朗普时期的“1776委员会”(1776 Commission),恢复“1619项目”(1619 Project)^①,提倡从种族正义的视角重新解读美国历史,同时宣布把“批判种族理论”教育纳入学校课程。拜登政府为“美国历史和公民教育”(American history and Civics Education)项目拨款530万美元,资助开展以“批判种族理论”和“1619项目”为核心的历史教学。同时,明确反对教育券进入私立学校,主张发展公立教育,包括增加联邦对公立学校的投资、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和提升教育质量,以此减少教育领域的不平等,确保所有学生都能接受优质的教育。此后的事实证明,该政策导致学生大规模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美国公立教育体系。在许多州,公立学校的资金分配与学生规模相关,学生数量的减少直接导致学校资金的缩减,使得剩余学生获得的教育资源减少,削弱了他们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最后,新冠疫情的暴发加剧了两党在教育领域的分歧和矛盾。在疫情初期,两党在学校如何应对疫情防控上的政策并无显著分歧。2020年3月,共和党州长麦克·德温(Mike DeWine)首先关闭了俄亥俄州的全部学校,随后其他各州纷纷效仿。^②在2020学年剩余的时间里,红蓝州学区均保持关闭状态,推行远程教学计划。在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后,共和党计划在秋季重新开放学校。特朗普总统于2020年7月在推特上强调“学校必须在秋天开学”,关闭学校是“导致死亡”的行为,甚至威胁要削减未开放学校的联邦资金。然而,民主党对此持保守态度,反对秋季学校全面开放。对于是否开放K-12学校,超过80%

^① “1619项目”的提出者是《纽约时报》编辑汉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在《纽约时报》2019年8月策划的一期特刊上,汉娜·琼斯将第一批黑奴到达美国的1619年作为美国历史的开端,否定以《独立宣言》发表的1776年为开端的传统主流历史叙事。作为对“1619项目”的反击,特朗普在2020年11月签署行政令,成立“1776委员会”。

^② Laura Meckler, “Seven States, D. C. Order All Schools Closed in Effort to Prevent Spread of Covid-19,”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2,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education/ohio-maryland-order-all-schools-closed-in-effort-to-prevent-spread-of-covid-19/2020/03/12/e4078b3a-6499-11ea-845d-e35b0234b136_story.html, 2023-12-20.

的民主党考虑学生和教师感染冠状病毒的风险，而共和党人中这一比例不足40%。^① 共和党强调重新开放学校的益处，而民主党则突出此举的潜在风险。这场红蓝政治对立在公众意识中勾勒出鲜明的界线：共和党倾向于支持学校开放，民主党则更注重风险规避。即便学校恢复线下教学，两党围绕学校的政治斗争仍未停歇。在学生是否应该在学校戴口罩、疫苗使用、保持社交距离等问题上，两党均坚持自身立场，使学校成为新的“文化战争”场所。

特朗普的偶像是里根，自诩是“新保守主义”代言人，他的教育改革有着浓重的“商人”和“保守主义”色彩。为了扭转回归保守的政治风向以及争取更多左翼的支持，拜登执政后继续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颁布较为激进的文化教育政策。在政治极化背景下，两党的党派对立和政治竞争反过来强化了各自的立场，在制定涉及价值观教育的法律和法案时，不可避免地输出各自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而导致教育议题在选举政治的运作下形成“党派站队”(party sorting)的趋势，民主、共和两党在教育政策上的立场分化显著，合作日益困难。

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教育领域的主要争论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教育领域存在诸多争论，涉及教育管理权的归属、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存废、基础教育“自由择校”的经费分配等方面，但是主要聚焦在两方面：一是教育内容之争——“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是否应该为历史教学的核心；二是教育权力(power)之争——父母是否有权干涉子女教育的“父母权利”运动。

(一) 教学内容之争：“批判种族理论”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保守派打破“政治正确”的束缚，对民主党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发起进攻，实施激进的白人至上主义和民粹主义政策，族裔冲突加剧。“批判种族理论”的存废被政治化，成为两党在公立学校教育政策上争

^① Juliana Menasce Horowitz, “Republicans, Democrats Differ over Factors K-12 Schools Should Consider in Deciding Whether to Reopen,”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5,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0/08/05/republicans-democrats-differ-over-factors-k-12-schools-should-consider-in-deciding-whether-to-reopen/>, 2023-12-20.

论的焦点。“批判种族理论”是民权运动后兴起的种族研究理论思潮,对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系统性、结构性、制度性的种族歧视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旨在祛除美国社会中的“肤色界限”和“色盲主义”(color blindness)等认知习惯和意识形态,解构白人主导的叙事模式,支持以少数族裔尤其是以黑人视角重新审视美国历史和社会。该理论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揭示美国黑人、妇女在法律体系中遭受歧视和不平等的“批判法律研究运动”(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① 20世纪90年代,“批判种族理论”转向教育领域,聚焦美国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的特殊经历,反对学校边缘化甚至排除少数族裔历史的教育方式,挑战传统教育史对“白人种族认同”(whiteness)的历史建构、逻辑理论和话语霸权。^②

随着“弗洛伊德事件”出现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发展,民众要求消除制度性种族主义的呼声愈发强烈,将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推向高潮。各级政府和学校开始接纳学者和民权活动人士的建议,将“批判种族理论”纳入教材,为雇员和学生提供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培训,促进该理论的传播和普及。^③ 在民主党和“批判种族理论”支持者的推动下,美国的公立学校、特许学校和私立学校纷纷开设种族研究课程,打破了以往中小学避免谈论种族问题的禁忌。例如,2021年10月,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签署法案,规定从2025学年开始,所有公立高中必须开设族裔研究(ethnic studies)课程,2030届学生需完成该课程才能毕业。^④ 这是加州近40年来首次修订高中课程教学方案,旨在确保K-12学生了解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的历史和文化,使加州成为美国首个将族裔研究纳入高中毕业要求的州。佛蒙特州、弗吉尼亚州等也通过法案,推广公立学校的种族研究教育。

“批判种族理论”原本是反种族主义的产物,但因其为边缘群体赋权、建构“反主流叙事”和清算美国历史中的种族主义等观点,招致保守派的强烈抵制。

^① 朱景文:《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评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第114—119页。

^② María C. Ledesma and Dolores Calderón, “Critical Race Theory in Education: A Review of Past Literature and a Look to the Future,” *Qualitative Inquiry*, Vol.3, No.21, 2015, pp. 206-222.

^③ 张业亮:《当前美国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对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探索》,《美国研究》2023年第1期,第12页。

^④ Meryl Kornfield, “California Becomes First State to Require Ethnic Studies for High School Gradu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9,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education/2021/10/09/california-ethnic-studies/>, 2024-06-02.

共和党主导的州议会通过地方立法抵制“批判种族理论”在美国公立学校的进一步推广。据《教育周刊》统计，截至2024年6月，已有44个州提出法案或采取措施，限制公立学校讲授“批判种族理论”，或规范教师在课堂上讨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系统性不平等问题的方式；密西西比、佛罗里达等17个州通过立法或其他途径实施对“批判种族理论”的禁令。^①其中，佛罗里达州的立法最为激进。作为“教育文化斗士”的州长德桑蒂斯多次提到“觉醒文化”(Woke Culture)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思想病毒，必须与学校、行业、美国政府机构中的“觉醒文化”做斗争，呼吁“佛州是‘觉醒文化’消失的地方！”，并在2022年签署《停止觉醒法》(或为《制止对孩童和雇员灌输法》)(Stop the Wrongs to Our Kids and Employees Act, Stop WOKE Act)。^②《停止觉醒法》禁止在工作场所、公立学校、学院和大学进行关于种族或性别的培训活动，尤其是可能使个人感到内疚、羞愧或愤怒的培训；限制在公立学校讲授“批判种族理论”及相关概念的讨论；要求教育机构公开课程内容，允许州内家长对学校课程内容提出异议，赋予父母“私人诉讼权”(private right of action)，即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起诉将“批判种族理论”纳入中小学基础课程的学区。^③然而，这些立法遭到自由派的反对，他们认为这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2022年8月，地方法院法官马克·沃克(Mark E. Walker)在裁决中写道“《停止觉醒法案》的部分观点违反了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并禁止佛罗里达州执行涉及企业培训的条款；^④2023年，联邦上诉法院裁定，限制佛罗里达州公立学院和大学教学内容的部分法律将继续被禁止。目前，联邦上诉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

^① Sarah Schwartz, “Map: Where Critical Race Theory Is under Attack,” *Education Week*, June 11, 2021, <https://www.edweek.org/policy-politics/map-where-critical-race-theory-is-under-attack/2021/06, 2024-06-10>.

^② Emily Mae Czachor, “‘Florida Is Where Woke Goes to Die,’ Gov. Ron DeSantis Says after Reelection Victory,” CBS News, November 9, 2022, <https://www.cbsnews.com/news/ron-desantis-florida-where-woke-goes-to-die-midterm-election-win/>, 2024-06-10.

^③ Renzo Downey, “Gov. DeSantis Signs ‘Stop W. O. K. E. Act’ as Legal Challenge Looms,” *Florida Politics*, April 22, 2022, <https://floridapolitics.com/archives/518717-gov-desantis-signs-stop-w-o-k-e-act-as-legal-challenge-looms/>, 2023-10-01.

^④ Chandelis Duster and Nicquel Terry Ellis, “What Federal Judges Have Said about Florida’s ‘Stop Woke Act’,” CNN, March 5, 2024, <https://www.cnn.com/2024/03/05/us/federal-judges-on-stop-woke-act-reaaj/index.html>, 2024-06-14.

的裁决,认定《停止觉醒法案》的部分内容违宪。^①

共和党控制的州通过立法手段禁止在教育系统中讲授“批判种族理论”,民主党将共和党的立场和行为称为种族主义“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两党围绕“批判种族理论”在教育领域的政治博弈,本质是政治极化背景下两党价值观对立的体现。民主党崇尚自由主义,支持者多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等中低收入阶层,而共和党推崇保守主义,维护中高收入阶层、白人新教徒的利益。根据《经济学家》的统计数据,超过75%民主党支持“批判种族理论”,约5%持反对态度;而共和党赞同该理论的比例不足10%,反对者超过80%。^②在这场政治博弈中,以拜登为首的自由派政党主张正视美国种族主义的黑暗历史和当前社会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歧视,提倡用“批判种族理论”团结各少数族裔,号召有色人种将“我们的故事”置于更为宏观的背景下,彰显他们在美国各领域的重要贡献。这标志着美国历史书写不再是以白人为主线的单向记忆,而是由多元主角联袂建构的集体记忆。

作为反击,特朗普称“‘批判性种族理论’、‘1619项目’和反对美国历史的十字军东征是有毒的宣传,是意识形态的毒药,如果不消除,将瓦解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公民纽带,摧毁我们的国家”。^③因此,要坚守美国的原则信念和国家认同,为年轻人提供爱国主义教育和真正的启发。^④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资助下,前美国费城协会成员麦克莱(Wilfred M. McClay)特别设计了一套旨在淡化群体间怨恨和身份认同分歧的历史教科书——《希望之地》(*Land of Hope*),试图以此取代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辛恩(Howard Zinn)的著作和“1619项目”的系列教材。共和党强调美国的荣耀,主张奴隶制历史并非美国历史上最核心的部分,“批判种族

① Shawn Nottingham, “Florida’s ‘Stop WOKE Act’ Commits a ‘First Amendment Sin,’ Appeals Court Says in a Ruling That Blocks Part of the Bill,” CNN, March 5, 2024, <https://www.cnn.com/2024/03/05/politics/florida-anti-woke-act-blocked-businesses/index.html>, 2024-06-10.

② “Americans Who Have Heard of Critical Race Theory Don’t Like It,” *The Economist*, June 17, 2021, <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21/06/17/americans-who-have-heard-of-critical-race-theory-dont-like-it>, 2024-06-10.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the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merican History,” National Archives Museum, September 17, 2020,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white-house-conference-american-history/>, 2024-06-14.

④ “Establishing the President’s Advisory 1776 Commission Federal Register,”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85, No.215, November 5, 2020,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11/05/2020-24793/establishing-the-presidents-advisory-1776-commission>, 2023-01-13.

“批判种族理论”与“父母权利”运动：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社会围绕教育问题的争论

理论”会带来分裂主义思想，同时否认美国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禁止在学校开设“批判种族理论”课程已成为保守派的“共同事业”。^①

（二）教育权之争：父母权利运动

随着美国社会围绕“批判种族理论”的争论逐渐升温，父母是否有权干涉子女教育及由此引发的父母权利运动也在悄然兴起。新冠疫情和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激发了美国保守派父母对政府过度干预教育的不满情绪。从疫情时期的学校关闭、疫苗和口罩强制令，到关于种族、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相关的课堂讨论，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控制权和政府在教育中的权力边界逐渐演变为更广泛的文化和教育分歧。保守派政治家将此视为巩固选民基础的契机，不仅将学校和学校董事会变为煽动家长愤怒和不满的阵地，而且在州和国会层面提出并通过一系列支持扩大父母权利的法案。^② 在政治势力的加持下，对进步派种族和性别观点进入校园感到不安的家长成为保守派的基层政治力量，使父母权利成为两党在公共教育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

美国联邦宪法并未对教育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也未曾提及父母的权利。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权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最高法院的两项重要司法判决。1923 年，在“梅耶诉内布拉斯加案”(*Meyer v. Nebraska*)中，^③最高法院首次裁定父母有权指导子女的教育，认定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条款保障了“结婚、建立家庭与抚育孩子的权利”，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权视为一项基本权利。^④ 在两年后的“皮尔斯诉姐妹会案”(*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中，^⑤最高法院重申对“梅耶诉内布拉斯加案”的判决，并强

① 张业亮：《美国种族斗争战火延烧至教育领域》，《世界知识》2022 年第 15 期，第 43 页。

② Elizabeth Tobin-Tyler, “The Past and Future of Parental Rights: Politics, Power, Pluralism, and Public Health,” *Virgini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Law*, Vol.30, 2023, pp. 313-314.

③ “梅耶诉内布拉斯加案”中，最高法院驳回了内布拉斯加州的一项禁止公立和私立学校教授外语的州法，认为该法律不仅侵犯教师的自由权利，也侵犯父母指导子女教育的权利。参见 *Meyer v. Nebraska*, 262 U. S. 390 (1923), JUSTIA. U. S. Supreme Court,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262/390/>, 2024-04-23.

④ 崔之元：《关于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三个理论问题》，《美国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121—136 页。

⑤ 在“皮尔斯诉姐妹会案”中，俄勒冈州的法律因强制要求所有的学生必须进入公立学校，遭到私立学校孩子父母的反对。最高法院基于“实质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条款，宣告俄勒冈州法律无效，阐明了家长在孩子教育中的重要角色。参见 *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 268 U. S. 510 (1925), JUSTIA. U. S. Supreme Court,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268/510/>, 2024-04-23.

调教育孩子也是父母的义务。^①但是,在普通法“国家亲权”(或“政府监护权”)(*parents patriae*)^②的理念影响下,法院从未表明父母权利的绝对性。当父母的行为被指控威胁到子女安全时,州儿童福利机构便会介入。此外,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权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公立学校教育中,即当州和地方教育局在其专业领域内制定教育决策时,父母无权干涉。正如在“皮尔斯诉姐妹会案”和“威斯康星州诉犹德案”(Wisconsin v. Yoder)中所示:父母有“决定是否送子女上公立学校的基本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决定公立学校如何教育他们的子女”。最高法院通过个人自主权和国家干预的双重视角分析父母权利,父母拥有教育、抚养和监护子女的自主权,而国家则可以在父母未能履行其照顾义务时行使干预权。

“父母权利”运动源于家长对学校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不满。疫情期间关闭学校、强制佩戴口罩和接种疫苗等激发了父母对子女教育的自主权与政府监护权的权力边界之争。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未成年人是否能接种疫苗并非新问题,但新冠疫情加剧了州政府要求接种特定疫苗和父母医疗自主权的紧张关系。作为民主党影响较大的选区,华盛顿特区颁布了《2020年未成年人同意接种疫苗修正案》(Minor Consent for Vaccinations Amendment Act of 2020),成为全国首个允许11岁以上、符合知情同意标准的儿童自行决定是否接种疫苗的法律。^③在2022年3月的“布斯诉鲍泽尔案”(Booth v. Bowser)中,儿童健康防御组织(Children's Health Defense)和父母权利基金会(Parental Rights Foundation)代表华盛顿特区的家长起诉市长鲍泽尔(Muriel Bowser)等,称该法律侵犯了父母的宪法权利和宗教自由权。最终联邦地区法官颁布禁令,导致该法律未能生效。^④根据盖洛普调查数据,超过80%的民主党人支持对所有学生实施疫苗接种强制要求,只有不到20%的共和党人同意

① *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 268 U.S. 510 (1925), p. 535.

② “国家亲权”源自拉丁文,指国家拥有家长式的权威,是儿童和其他法律上无行为能力人的最终监护人,当他们的健康或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有权排除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侵权行为的权力。参见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parents_patriae, 2024-04-20.

③ D. C. Law 23-193, “Minor Consent for Vaccinations Amendment Act of 2020,” Council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https://code.dccouncil.gov/us/dc/council/laws/23-193>, 2024-04-20.

④ *Booth v. Bowser*, 597 F. Supp. 3d 1. 8 (D. D. C. 2022), <https://casetext.com/case/booth-v-bowser/>, 2024-04-20.

这一观点。^①

学校的口罩强制令本是为减少疫情传播而推行的一项基本公共卫生措施，却在共和党的推动下迅速演变成父母权利问题。从马里兰州到加利福尼亚州，抗议者挤满学校董事会会议厅，父母们高举“我的孩子，我的选择”“解除孩子们的口罩”等标语牌。^② 一些家长担忧戴口罩会影响孩子的舒适度、社交互动和心理健康，另一些则视其为政府的过度干预。^③ 当共和党政客意识到反对口罩强制令可以拉近与选民的距离时，多个共和党主导的州开始禁止学校实施口罩强制令，如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州等。德桑蒂斯甚至签署《确保父母拥有在校选择口罩的自由》(Ensuring Parents' Freedom to Choose-Masks in Schools)的行政命令，明确赋予父母决定孩子是否在校戴口罩的权利。^④

除了疫苗接种和口罩强制令引发部分家长对政府的强烈不满情绪外，疫情导致的学校关闭和远程教学使家长首次深入了解学校的课程内容。一些学生父母对涉及种族、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教学内容感到“愤怒”。“父母权利”运动倡导者要求加强父母对学校课程和阅读材料的知情权和控制权，移除课程中有关种族、性别认同、性行为 and 生殖健康的书籍。这得到包括“自由母亲”(Moms for Liberty)、“父母权利基金会”“教育不左转”(No Left Turn in Education)等全国性组织的积极响应与广泛支持。为了响应不断发展的父母权利运动，共和党在全美公立学校掀起“禁书运动”。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的数据，2022年，公立学校和图书馆的图书审查请求高达2571种，创下历史新高，被审查的书籍大多涉及性少数群体，或者由黑人、印第安人和有色人种撰写或者与之相关的图书。^⑤ 比如，2022年被审查移

① Jeffery M. Jones, “Public Divided on Student COVID-19 Vaccine Requirements,” Gallup, August 15, 2022, <https://news.gallup.com/poll/396590/public-divided-student-covid-vaccine-requirements.aspx>, 2024-04-20.

② Julia Carrie Wong, “Masks Off: How US School Boards Became ‘Perfect Battlegrounds’ for Vicious Culture Wars,” *The Guardian*, August 24, 20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1/aug/24/mask-mandates-covid-school-boards>, 2024-04-29.

③ Katie Reilly, “School Masking Mandates Are Going to Court. Here’s Why the Issue Is So Complicated,” *Time*, October 1, 2021, <https://time.com/6103134/parents-fight-school-mask-mandates/>, 2024-04-20.

④ Sarah Mervosh, “Florida’s Governor Gives Parents Final Say on Masks for Children in School,” *New York Times*, July 30,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7/30/us/florida-desantis-masks-schools.html>, 2024-04-25.

⑤ “Censorship by the Numbers,” Banned & Challenged Books, <https://www.ala.org/advocacy/bbooks/by-the-numbers>, 2023-09-10.

除最多的书籍为《性别酷儿：回忆录》(*Gender Queer: A Memoir*)。^① 图书审查的申请遍布除内华达州与特拉华州外的美国各州，保守州对图书审查的呼声更高，而自由派主导的州相对较少，其中，得克萨斯州以93次申请审查2349本书籍位居榜首。作为反击，拜登谴责共和党发起的“图书禁令”是在“试图摧毁美国自由堡垒”，并任命专人策划应对“禁书运动”的方案。^②

为了增强父母在教育领域的话语权，共和党在州和国会层面积极推动有关父母权利的立法。2022年，26个州提出85项相关法案，其中多数由共和党立法者发起，最终6项法案成为法律。2023年，24个州提出62项法案，主要围绕性别和种族议题，旨在提升父母在子女教育中的影响力。^③ 共和党保守派甚至将“父母权利”议题推向国会立法议程。2023年3月24日，众议院以213:208的微弱优势通过了《父母权利法案》(Parents Bill of Rights Act)，该法案加强了父母在审查学校课程、图书馆藏书及参与学校政策制定方面的权利，并要求学校向家长公开图书馆书目、阅读材料清单和学校课程内容。^④ 该法案的投票结果几乎完全以党派划分，203名民主党人和5名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⑤ 共和党支持者认为该法案将“确保父母权利在公立学校得到尊重和保护”，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学习体验”。民主党人指出，此法案对学生并无实质性帮助，可能成为审查制度和禁书运动的法律基础，加剧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分歧，将同性恋和跨性别学生置于更高的风险中。^⑥ 鉴于参议院的党派构成，《父母权利法案》的通过率极低。多数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已经明确承诺，法案一旦提交至参议院，将被“立即否决”。^⑦

① “Top 13 Most Challenged Books of 2022,” Banned & Challenged Books, <https://www.ala.org/advocacy/bbooks/frequentlychallengedbooks/top10>, 2023-09-10.

② 徐海娜、龙林坤：《拜登政府的激进社会文化政策及其国内博弈》，第118页。

③ Bella DiMarco, “Legislative Tracker: 2023 Parent-Rights Bills in the States,” *Future Ed*, March 16, 2023, <https://www.future-ed.org/legislative-tracker-2023-parent-rights-bills-in-the-states/>, 2024-06-10.

④ “H. R. 5: Parents Bill of Rights Act,” Congress. GOV, March 24, 202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house-bill/5>, 2024-06-20.

⑤ Ibid.

⑥ Annie Karni, “Divided House Passes G. O. P. Bill on Hot-Button Schools Issues,”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03/24/us/politics/parents-bill-of-rights-act.html>, 2023-09-10.

⑦ Shawna Mizelle and Kristin Wilson, “House Passes GOP Education Bill That Aims to Provide Additional Oversight for Parents,” CNN, March 24,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3/24/politics/house-vote-parents-bill-of-rights-act/index.html>, 2023-09-10.

“父母权利”运动由社会群体、宗教组织和政治目标共同推动，与保守派限制学校讨论种族、性少数(LGBTQ)权利等争议话题的目标紧密相关。该运动反对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将多元文化主义视为对父母教育权的威胁，主张父母有权决定子女接受何种教育，政府的干预应该最小化。相较之下，民主党认为教育是一种公共利益和普遍的社会福利，其重要性高于父母个人的权利。尽管父母拥有子女的教育权，但不应该主宰学校的教学内容，更不能将“公立学校变成私人家教”^①。过度的父母权利会导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对于依赖公共教育的弱势群体尤为不利。因此，民主党主张政府在教育领域应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以符合国家公共利益和美国民主制度的要求。

三、美国教育问题争论生成的政治逻辑

美国教育问题的成因复杂多元，涉及选举政治的催化、两党政治博弈、联邦和州权冲突、利益集团的推动及最高法院的保守转向等。这些因素相互促进与强化，导致民主、共和两党在教育议题上的分歧日益显著，教育改革趋向极端化、标签化。

(一) 选举政治的“扭曲效应”引发教育领域的分歧

美国的教育政策之所以出现不连续性、不稳定性，甚至自相矛盾等问题，与其两党轮番执政直接相关。随着政治极化的加剧，严重的党争影响了国会的立法效率，党派各自推动的利益决策难以转化为实际政策。

经历多年的选举政治洗礼，美国的政党体系及媒体格局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个利益体制，争取选民的支持成为选举政治的首要目标。^② 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为了赢得选民的拥护，明确表达对关键问题的立场和解决方案，甚至提出极具争议性的政策主张，以便更好地吸引和迎合选民。选民因此能够更清晰地识别与自己价值观相契合的党派并选择加入，导致“党派站队”现象日益

^① Samantha R. Foran, “Parents’ Rights or Parents’ Wrongs?: The Political Weaponization of Parental Rights to Control Public Education,” *Wisconsin Law Review*, Vol.2022, No.6, 2022, p. 1536.

^② 王希：《特朗普为何当选？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历史反思》，《美国研究》2017年第3期，第28页。

明显,即多数普通选民的意识形态倾向变得更加明确和统一,对政党的忠诚和支持亦愈发显著和坚定。^① 当新的“摇摆选民”群体出现时,两党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差异化的政策和候选人来吸引这部分选民,同时调整党内的政策主张以回应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全国公立特许学校联盟(National Alliance for Public Charter Schools)委托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The Harris Poll)对5000余名学龄儿童家长进行的全国性调查显示,“教育选民”(education voters)正成为新的“摇摆选民”。^②根据民调数据,83%的家长肯定教育的重要性,在选举中将教育议题视为仅次于税收的第二重要问题;此外,家长们表示教育是他们投票的关键考虑因素之一,82%的父母不会拘泥于所属政党,会根据候选人的教育立场投票。^③ 新冠疫情的暴发使父母群体崛起为新的强大选民力量,他们要求在孩子的教育中拥有更大发言权,并认可他们在孩子教育中重要作用。共和党人有效地利用了家长的愤怒和焦虑心理,发起一系列政治运动,提出加强父母教育权的法案,以赢得家长群体的支持。

青年选民以其巨大的政治潜力和影响力,成为民主、共和两党扩大票仓的必争群体。两党均认识到教育在传递政党的价值观、塑造青年选民政党忠诚度和激发选民政治热情的重要作用。“1619项目”和“1776委员会”之争反映了两党塑造青年群体政治认同上的较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为美国培养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为什么样的美国,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辩论。目前,“Z世代”(Generation Z)^④是美国合法选民群体增长最快的群体。根据皮尤数据统计,“Z世代”在2016年首次参与选举时,合法选民数量为700万,占总合法选民的4%;2020年大选时,该群体的合法选民数量飙升至2400万,占比达到10%,在选民群体中占据更显著地位,超越了“沉默一代”(Silent Generation)^⑤

① 节大磊:《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美国研究》2016年第2期,第64页。

② Nina Rees, “Meet the New Swing Voter: the Education Voter | Opinion,” *Newsweek*, September 23, 2022, <https://www.newsweek.com/meet-new-swing-voter-education-voter-opinion-1745066>, 2024-06-20.

③ “Is the ‘Education Voter’ the New Swing Voter?” Public Charter Schools, June 21, 2022, <https://publiccharters.org/news/is-the-education-voter-the-new-swing-voter/>, 2023-12-10; Kristen Blair, “2022 Poll: ‘The Education Voter Is the New Swing Voter’,” North Carolina Coalition for Charter Schools, June 24, 2022, <https://nc.chartercoalition.org/2022/06/24/2022-poll-the-education-voter-is-the-new-swing-voter/>, 2024-06-20.

④ “Z世代”指美国1997—2012年之间出生的人口,约占全美总人口的26%,其中年龄最大的一批正走出校园、迈向社会。从族群结构来看,“Z世代”大学生中白人约占53%,拉美裔约占20%,是美国历史上族群分布最多样化的一代大学生。

⑤ “沉默一代”指美国1928—1945年之间出生的人。

“批判种族理论”与“父母权利”运动：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社会围绕教育问题的争论

的选民数量。^① 在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Z 世代”的投票率超过 53%，成为有史以来总统选举投票率最高、政治参与最活跃的青年人群。^② 在 2022 年中期选举中，他们的积极参与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共和党所谓的“红色浪潮”，其政治崛起受到广泛关注。^③ 预计到 2024 年大选，“Z 世代”与“千禧世代”（Millennials）^④ 的合法选民将占到选民总数的四成以上，他们或将对美国政治的走向发挥决定性作用。^⑤ 为了稳定各自的竞选优势，更好地塑造和赢得潜在的青年选民，共和党坚守美国的原则信念和国家认同，推行基于“美国例外论”之上的威权式爱国主义教育，禁止在学校开设“批判种族理论”课程。民主党则选择拥抱“批判种族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正视美国种族主义历史，强调基于“批判种族理论”之上的爱国主义教育。随着美国中期选举和总统竞选活动的不断开展，新政府致力于减少前任政府政策的持续效应，并强化自身政策的权威，教育领域的改革也是如此。因此，每一次选举都是对美国教育政策的冲击，也造成美国社会的又一次分化。

（二）两党政治博弈是导致教育争论的重要因素

美国教育领域的问题正逐渐演变成一场“文化冲突”，其中，党派身份与教育政策立场之间呈现高度相关性。民主党将教育领域内的性别认知、种族平等，以及对少数族裔权利的关注视为其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不仅展现了左翼激进主义的立场，而且与民主党推崇的包容、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价值观相契合，是其政策制定和政治倡导的基石，也是用以展现“政治正确”并动员左翼支持者的重要抓手。民主党倾向于利用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平台，通过课程改革、多元化教育和反歧视政策，培养年轻一代的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打破传统教育体系中的不平等结构，为所有学生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构

^① Anthony Cilluffo and Richard Fry, “An Early Look at the 2020 Electorate,”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30,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19/01/30/an-early-look-at-the-2020-electorate-2/>, 2024-6-20.

^② Abigail Hess, “The 2020 Election Shows Gen Z’s Voting Power for Years to Come,” CNBC, November 18,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11/18/the-2020-election-shows-gen-zs-voting-power-for-years-to-come.html>, 2023-09-20.

^③ 周顺：《美国“Z 世代”对华认知的表现、成因及影响》，《当代美国评论》2023 年第 2 期，第 19—40 页。

^④ “千禧世代”指美国 1981—1996 年之间出生的人，为“婴儿潮”一代的子女。

^⑤ Morley Winograd, et al., “How Younger Voters Will Impact Elections; Younger Voters are Poised to Upend American Politics,” Brookings, February 27, 2023,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younger-voters-are-poised-to-upend-american-politics/>, 2023-09-20.

建更加开放、包容和多元化的教育环境。对共和党而言,特朗普信奉的是根植于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保守主义,其经济与公共政策倾向于保障白人群体在社会资源分配和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维护其利益并确保他们在国家发展和规则制定中保持话语权和影响力。^①

20世纪90年代前,美国的两党制实质上由保守派民主党人、保守派共和党人、自由派民主党人、自由派共和党人构成的“四党体制”(the four-party system)。自由派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民主党人立场中立温和,重视国家利益,能够推动政策理念超越狭隘党派利益,被视为维护政党政治健康运作的关键力量。然而,“四党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瓦解,到2020年,自由派共和党人几乎销声匿迹,保守派民主党人在国会中的活跃分子也寥寥无几。^②政党体制的变化和“温和派”(moderates)的式微加剧了党派分歧,导致两党意识形态的对立。民主、共和两党均放弃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与多元文化的中间立场,两党的身份政治转向完成,共和党略偏向白人群体,而民主党更多地代表少数族裔的利益。^③保守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对决,逐步转化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策层面的相互否决,并通过总统频繁发布行政命令得到进一步强化。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否决政治”在当前的美国政坛大行其道。^④两党在教育政策上的对立与政治极化密不可分。民主党强调联邦政府在保障教育机会平等重要作用,主张继续扩大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提高教师待遇,建立统一的基础教育评价标准,确保学生在阅读、写作、数学和科学等关键学科上达到基本能力要求。然而,共和党坚持保守的意识形态,强调个人选择和责任,主张有限的政府干预,倾向于由州和学校董事会自主制定教育政策,在基础教育阶段增加父母选择权,倡导自由择校。

两党在教育问题上互相攻讦,导致学校成为党争的“战场”,教育改革政策沦为政治博弈的筹码和牺牲品。共和党及其支持者批评民主党过度强调联邦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专注于少数族裔而损害了白人群体的利益,并在教育领域发起对民主党的批判行动。民主党及其支持者反击,指责保守派推动的白

① 何晓跃:《论美国种族主义的新发展》,《国际观察》2022年第2期,第94页。

② 王格非:《政治极化与政治冲突的“变质”:当前美国政治困境及原因》,《美国研究》2022年第3期,第84页。

③ 翟迈云、李庆四:《为谁讲故事:美国两党的国家叙事之争》,第96页。

④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4页。

“批判种族理论”与“父母权利”运动：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社会围绕教育问题的争论

人至上主义，拜登在 2024 年竞选时称白人至上主义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控诉共和党对种族不公问题的关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伪善。^① 党派争端渗透到教育领域，不仅是共和党保守派与民主党自由派之间的冲突，也体现了美国本土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在国家发展愿景上的矛盾。

（三）联邦和州、地方的权力冲突是教育问题的加速器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作为美国政治体系中的不同权力主体，各自保有对民众的直接管辖权和排他性权力。由于宪法规定的模糊性，联邦和州围绕不同议题的权力冲突从未停止。^② 美国宪法未明确提及“教育”，根据第 10 修正案，“本宪法所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之权力，皆由各州或人民保留之”。^③ 这确立了美国教育行政体制的地方分权制，即办学和管理的主要责任集中在各州和地方，尽管各州在法律上对公共教育负责，但治理学校的权力大多被下放给地方官员。^④ 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干预各州的教育，只有援助的职能，发挥服务性质的作用。^⑤ 在美国，公立学校的资金主要来自州和地方政府，仅约 8% 的资金来自联邦政府。^⑥ 由此可见，州及地方政府是公立中小学经费的主要提供者，而联邦政府则充当辅助性的资金提供者。教育治理权主要掌握在学校董事会手中，州教育厅对本州教育董事会负责，不对州长负责。^⑦ 1980 年，联邦教育部正式升级为内阁级别的政府机构。为了维护州级教育行政管理权，联邦教育部法案规定：“教育的权限和责任归州和地方学区以及州规定的其他机构。”^⑧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联邦政府逐步加大对教育事务的介入，通过立法和财政拨款等手段对教育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成为领导基础教育改革和推

① Toluse Olorunnipa, “Biden Calls White Supremacy Greatest Terrorism Threat as 2024 Race Heats up,”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4,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3/05/14/biden-white-supremacy-howard-university/>, 2023-12-26.

② 张业亮：《奥巴马执政以来的美国联邦权和州权冲突》，第 48—49 页。

③ 《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16 页。

④ Rebecca Jacobsen and Andrew Saultz, “The Polls-Trends: Who Should Control Educ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76, 2012, pp. 379-390.

⑤ 郑文：《当代美国教育问题透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2002 年版，第 17 页。

⑥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he Federal Role in Education,” <https://www2.ed.gov/about/overview/fed/role.html>, 2024-06-20.

⑦ 王定华：《走进美国的教育》，第 14 页。

⑧ 郑文：《当代美国教育问题透视》，第 17 页。

动教育公平的重要力量。面对联邦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权力扩张,20世纪80年代,各州通过集中教育资金、制定州级课程标准、提高教师要求等方式,收回对地方教育的控制权。^① 尽管教育权逐渐从地方向州和联邦政府集中,但多数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地方对公立学校的控制。小布什政府曾对不遵守联邦教育法规的州教育局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威胁扣留联邦教育拨款。例如,俄亥俄州的教育法规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存在多处冲突,联邦政府因此发出警告,若不及时修正法规以符合联邦要求,将面临扣发联邦教育拨款的惩罚。鉴于州政府的财政压力,联邦教育资金对俄亥俄州至关重要,州内各界也不会同意失去这笔教育经费,州长因而向州议会施压,要求迅速修订相关教育法规。^② 同样,在疫情期间,拜登总统也曾经对禁止学生戴口罩的州,采取扣留其联邦教育拨款的威慑。^③ 然而,在联邦制国家结构中,联邦与州分属不同的行政层级,各自拥有独立的教育管理系统。研究表明,当下美国州级层面中存在所谓的“反党派回应”(counter-partisan response)现象,即某一政党主导联邦政府时,对手党派在州级层面会采取更积极的措施。^④ 因此,共和党的教育政策在州级层面尤为显著,尤其在当前共和党州长人数多于民主党的政治格局下。目前,50个州有27名共和党州长和23名民主党州长,其中,11个州将在2024年进行州长换届选举。^⑤ 这一统计数据表明,在州级行政领导层面上,共和党比民主党拥有更多的代表权和影响力,两党在州级政治力量对比将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相应的党派效应。

在州级层面,两党围绕“批判种族理论”和“父母权利”运动的政治博弈比联邦层面更为激烈,立法成为教育领域斗争的主要形式。在此前的3个学年中,45个州的立法者共提出283项法案,试图限制教师关于种族主义和美国历

① Allan Odden and Lawrence Picus, *School Finance: A Policy Perspective*,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William J. Reese,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From the Common School to "No Child Left Behi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王定华:《走进美国的教育》,第305—306页。

③ Monique El-Faizy, "Biden Threatens Governors Opposing School Mask Mandates with Legal Action," *France 24*, August 20, 2021, <https://www.france24.com/en/americas/20210820-biden-threatens-governors-opposing-school-mask-mandates-with-legal-action>, 2023-12-26.

④ Nicholas S. Miras and Stella M. Rouse, "Partisan Misalignment and the Counter-Partisan Response: How National Politics Conditions Majority-Party Policy Making in the American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2, No.2, 2022, pp. 573-592.

⑤ Louis Jacobson, "The 2024 Governor Races: Which States Are Safely Republican or Democratic and Which Could Swing Either Way?" *U. S. News*, June 4, 2024, <https://www.usnews.com/news/elections/articles/2024-06-03/rating-the-2024-governor-races-north-carolina-new-hampshire-are-toss-ups>, 2024-06-20.

“批判种族理论”与“父母权利”运动：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社会围绕教育问题的争论

史等相关教学内容的讨论,改变教师对性别议题的教学方式,增强父母在子女教育决策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其中,已有 64 项法案在 25 个州获得批准成为法律,影响到美国 42% 的人口。^① 由此可见,立法成为两党在教育领域博弈的主要形式之一,这不仅塑造了美国教育政策的走向,也暴露了教育体系内的政党意见分歧,凸显美国教育改革面临的挑战。

(四) 利益集团政治和最高法院全面右转成为美国教育问题激化的推手

教育改革在美国面临多重挑战,不仅掣肘于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也受党派背后的利益集团驱动。教育利益集团的建立和发展根植于民众参与教育的历史传统,弥补了地方分权教育管理体制的不足。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政治献金、动员选民等方式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施加影响。^② 主要的教育利益集团包括:(1) 教师职业协会:全美教育协会、美国教师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等;(2) 学生和家长组织:美国学生联合会(United States Student Association)、全国家长教师协会(National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等;(3) 学校董事会和管理组织: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National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等。^③

在美国,绝大多数教师都是工会会员,教师组织有很强的势力,全美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联盟最具有代表性。例如,全美教育协会在 1979 年教育部升级为内阁级别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一位记者所言,“华盛顿最有力的游说集团——全美教育协会,是推动成立价值 35 亿美元教育部的关键因素”。^④ 全美教育协会联合美国教师联盟和劳联—产联,共同推动制定有利于教育发展的联邦财政计划。教师工会是一个强大的倾向支持民主党的利益集团,反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使用教育券进行自由择校”、禁止教授“批判种族理论”等政策。以自由择校为例,在政策实施前,教师组织属于既得利益集团;在政策实施后,若多数学生利用政府的补助(教育券)转入私立学校或教会学校,公

^① Hannah Natanson, et al., “An Explosion of Culture War Laws Is Changing Schools,”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8,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education/2022/10/18/education-laws-culture-war/>, 2023-01-30.

^② 周小虎:《协调? 制衡?:美英利益集团对教育政策的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71 页。

^③ “National Education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Vote Smart*, <https://justfacts.votesmart.org/interest-groups/NA/27>, 2024-06-24;周小虎:《协调? 制衡?:美英利益集团对教育政策的影响》,第 55 页。

^④ 谭融:《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3 页。

立学校经费大幅减少,进而影响教学质量。教学质量不佳的公立学校将因生源不足而面临关闭。为维护自身的利益,避免与非公立学校的激烈竞争,教师工会强烈反对自由择校政策。^①在地方层面,学校董事会的竞选通常是非党派性的,投票与其他选举分开进行,但这种党派绝缘的教育局面已经被保守派政治行动团体侵蚀。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巨额资金,支持“父母权利”倡导者、“批判种族理论”反对者等保守派学校董事会候选人。^②教师工会和自由派草根团体通过资金和舆论进行反击,抨击保守派活动家为“恐惧散布者”,指责他们企图操纵家长反对公立学校,边缘化 LGBTQ 学生群体,并转移选民对争议政策的关注。

最高法院的全面右转加剧了教育议题的争议。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守派法官逐渐取代自由派大法官,至2020年完全掌控最高法院的主导地位。^③2022年6月24日,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女性健康组织案”中,以6:3的表决结果,推翻了近50年的“罗伊诉韦德案”判例,不再从宪法层面支持妇女堕胎权。判决立场的转变并非源于宪法条文的修订,而是由于最高法院大法官构成发生变化。^④支持推翻原判例的六位保守派大法官均由共和党总统提名,而维护原判例结果的三位自由派大法官由民主党总统提名。在“多布斯”案的裁决中,党派色彩浓郁,大法官之间的政党化倾向揭示了司法解释者并非完全超脱政治影响,这也导致最高法院的公信力受到质疑。^⑤最高法院全面右转对教育领域最直接的影响是:2023年6月,“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判决先例被推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宣布高校在招生时必须采用种族中立的标准,终结了美国长达半个多世纪对少数族裔教育的优待政策。

总之,美国的选举制度,轮番执政的两党制,联邦与州、地方的权力斗争,利益集团政治,以及最高法院的全面右转都加剧了两党在教育议题上的分歧。

① 周小虎:《协调?制衡?:美英利益集团对教育政策的影响》,第78页。

② Colin Binkley and Julie Carr Smyth, “Conservative PACs Inject Millions into Local School Races,” AP News, October 12, 2022, <https://apnews.com/article/entertainment-elections-education-school-boards-teaching-059f2465829ab009394469b95c8cc94a>, 2023-12-21.

③ 张毅:《美国最高法院完成全面右转》,《美国研究》2023年第1期,第35页。

④ 同上,第47页。

⑤ Jeffrey M. Jones, “Confidence in U. S. Supreme Court Sinks to Historic Low,” Gallup, June 23, 2022, <https://news.gallup.com/poll/394103/confidence-supreme-court-sinks-historic-low.aspx>, 2023-08-30.

以民主党、教师工会为代表的自由派与以共和党、家长权倡导者的保守派相互对峙，构成教育政策上对立博弈的双方，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治社会的分裂。

四、美国社会围绕教育议题争论的影响

美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目的在于激发教育在促进个体成长与社会进步方面的关键作用，培养个体的独立性与社会参与能力，实现社会阶级流动。^①然而，随着美国政治博弈日益加剧，各政治派别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在教育议题上提出党派色彩浓厚的观点和政策，这不仅严重危害地方的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降低了教育的公共福利作用，还在宏观层面对主流价值观构成挑战，削弱民众对国家身份的认同感。

首先，政治极化导致公立教育体系标准化程度不足，影响地方的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减缓社会流动性。由于缺乏统一的教育标准，各州在课程设置、学生评估及教师资格认证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教育的多样性和地方特色，但难以弥合各州和地区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在教育资源获取上存在显著不平等，使得家庭贫困的学生难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从而印证了“寒门难出贵子”^②的社会现实。富裕家庭的学生更容易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和高薪职业，而经济困难的学生则因教育资源的匮乏，职业发展和社会上升空间面临阻碍。长期而言，教育上的不平等将转化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等，固化贫富差距，减缓社会阶层流动。近年来，频繁出台的教育立法和政策聚焦于“文化战争”，真正提升教学质量和学习成效的法规相对较少。根据统计数据，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美国学生的数学和阅读进度，数学平均课程进度比疫情前落后5个月，阅读落后了4个月，在少数族裔学生集中的学校，教学进度落后更为突出；以低收入家庭学生为主的学校教学进度落后达7个月，且辍学率呈上升趋势。^③同时，家长对

① 王芳：《两党政治下美国教育政策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以新世纪以来教育改革政策为例》，第115页。

② 参见沈镇：《“寒门难出贵子”：读罗伯特·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美国研究》2018年第3期。

③ Emma Dorn, et al., “Covid-19 and Education: The Lingering Effects of Unfinished Learning,” McKinsey & Company, July 27, 2021,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education/our-insights/covid-19-and-education-the-lingering-effects-of-unfinished-learning>, 2023-12-23.

公立教育质量的质疑增多,对教育系统的信任度下降。2022年盖洛普的调查数据显示,家长对K-12教育的满意程度降至42%,创20年来新低。此外,对公立教育持“高度信心”的美国人比例降至28%,是自1973年有记录以来的第二低。^①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不均衡,不仅凸显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反映了美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深层次问题。

其次,学校逐渐演变为政治博弈的战场,对教育工作者产生“寒蝉效应”,加剧了公立学校的教师流失。随着党争日益渗透到各级教育领域,教师们被迫在政治和社会观念的冲突中寻求平衡,同时坚守教育使命。他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需要谨慎地处理可能引发争议的敏感话题,避免激化家长、学生或学校管理层的不满。^②与私立学校教师相比,公立学校教师面临更严格的教学审查,常被要求在课程中融入特定观点或回避某些议题。例如,俄克拉何马州的H. B. 1775法案明确规定对公立学校课堂中关于种族和性别议题的讨论实施审查机制。根据该法律,教师无论有意或无意涉及禁止议题,都将面临中止教学活动及撤销教师资格证的惩罚。^③此类立法对学术自由和教育客观性构成潜在威胁,限制了教师在课堂上探讨多元思想的自由,加剧了教师群体的恐惧和不满。根据《华盛顿邮报》分析,在2020—2022学年内,全美有超过160名教育工作者因校园“文化战争”辞职或被解雇,每周平均有超过两名以上的教师失业。^④佛罗里达州教育协会主席安德鲁·斯帕尔(Andrew Spar)指出,K-12教育的政治化是“促使资深教师离开教育行业”的因素之一。^⑤教师的流失率因工资低、工作负担重、学生行为问题及课程和教学的政治化,不断攀升。“教师荒”现象不断升级,许多州不得不降低教师资质标准,甚至聘用不具备资

① “Confidence in U. S. Institutions Down; Average at New Low,” Gallup, July 5, 2022, <https://news.gallup.com/poll/394283/confidence-institutions-down-average-new-low.aspx>, 2023-10-20.

② Tim Walker and Senior Writer, “Teaching in an Era of Polarization,” NEA News, July 14, 2021, <https://www.nea.org/nea-today/all-news-articles/teaching-era-polarization>, 2023-12-26.

③ Madeline Holcombe, “ACLU Sues Oklahoma over Law Prohibiting Critical Race Theory Topics from being Taught in Schools,” CNN, October 19, 2021, <https://www.cnn.com/2021/10/19/us/oklahoma-lawsuit-critical-race-theory/index.html>, 2024-06-26.

④ Hannah Natanson and Moriah Balingit, “Caught in the Culture Wars, Teachers Are being Forced from Their Jobs,”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6,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education/2022/06/16/teacher-resignations-firings-culture-wars/>, 2023-12-26.

⑤ Scott Neuman, “The Culture Wars are Pushing Some Teachers to Leave the Classroom,” NPR, November 13, 2022, <https://www.npr.org/2022/11/13/1131872280/teacher-shortage-culture-wars-critical-race-theory>, 2023-12-26.

格认证的教师。^①

再次，政党撕裂和教育理念的分歧促使教育改革的负向功能增强，青少年政治态度极端化。批判教育学家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W. Apple)认为，教育是斗争与妥协的场所，反映了政治领域的斗争态势，同时对政治斗争的结果产生影响。^② 尽管美国教育改革的初衷是最大化教育的正向功能，但在政治斗争的裹挟下，改革的负向功能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和教育机会不平等，部分学校和学生群体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关注。穷孩子难以进入顶尖大学，即使有幸进入大学，也多集中在社区大学，社区大学往往难以助力他们实现阶层的跃升。^③ 数据显示，仅有 29% 的贫困优秀学生能完成大学学业，而成绩差的富裕学生有 30% 能获得学位，贫困且成绩差的学生获得学位的比例仅为 3%。^④ 家庭背景对教育成就的影响超过了学业表现，这严重削弱了“美国梦”所倡导的机会平等理念。高等教育机构中党派支持的比例变化反映了青年政治立场的分化。20 世纪 80 年代，高学历选民大多支持共和党。例如，里根在 1984 年选举中获得 61% 的高等教育群体选票，而当前大学生对民主党的支持率远超共和党，比例大约为 11.5 : 1。^⑤ “Z 世代”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在 2016 年总统选举中，“Z 世代”对希拉里的支持率比特朗普高出 19 个百分点；^⑥ 在 2020 年大选中，这一趋势得到加强，拜登获得该群体的支持率是特朗普的两倍，领先优势扩大至 32 个百分点。^⑦

最后，两党大肆利用教育的政治功能，将教育改革极端化和标签化，加剧了美国主流价值观危机。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表达了对美国国家认同和族群构成变化的担忧，指出美国即将面临族群和身份危机，但他未能预见这些危机会与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深层

① Gabe Cohen, “Doubling Up on Classrooms, Using Online Teachers and Turning to Support Staff: How Schools are Dealing with the Ongoing Teacher Shortage,” CNN, September 11, 2023, <https://www.cnn.com/2023/09/11/us/ongoing-teacher-shortage-creative-solutions/index.html>, 2024-06-26.

② 王佳佳、王意萌：《美国家长组织参与教育改革的路向偏差及其匡正》，《全球教育展望》2024 年第 3 期，第 137 页。

③ Robert D. Putnam,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15, pp. 185-186.

④ Ibid., pp. 189-190.

⑤ 王芳：《两党政治下美国教育政策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以新世纪以来教育改革政策为例》，第 116 页。

⑥ “Exits Polls 2016,” CNN, November 9, 2016, <https://edition.cnn.com/election/2016/results/exit-polls>, 2024-06-24.

⑦ 周顺：《美国“Z 世代”对华认知的表现、成因及影响》，第 19—40 页。

问题同步爆发,形成复合型的国家危机。^①在教育改革方面,民主党自诩为促进社会公平的“正义者”,提倡政府应主导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师待遇,并为少数族裔学生提供政策倾斜,以确保他们获得优质教育。共和党则自视为国家荣誉和团结的“守护者”,强调教育应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深化对美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并联合家长团体,共同抵制教育领域的“批判种族理论”。两党的教育立场分歧加深了不同群体间的文化隔阂,削弱了社会凝聚力,进一步加剧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分裂。2023年,《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显示,对美国国民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的传统价值观,如爱国主义、宗教信仰等,在公众心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大约38%的受访者认为爱国主义极为重要,39%表示宗教至关重要,1998年首次调查时的比例分别为70%和62%;2019年,80%的美国人强调对他人宽容非常重要,但2023年这一比例已降至58%;同时,认为金钱很重要的人数呈上升趋势。^②美国人对“身为美国人”(to be American)的自豪感持续下降。21世纪前,这一比例保持在90%以上,从2001—2016年间维持在80%以上,但是,在特朗普当选后,该比例持续下跌,2017年3月降至75%,其中,极度自豪的占51%,非常自豪的有24%;到2022年6月,极度自豪的比例降至38%,非常自豪为27%,对“身为美国人”感到自豪的比例降至新低。^③

结 语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在2017年推出经典著作《我们的孩子》。此书甫一出版,即刻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原因在于直击当代美国社会的核心问题:曾经激励无数人追求“平等机会”的美国梦已经破碎,教育促进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功能减弱。美国种族结构的多样化和白人主体地位的衰落,辅之特朗普政府“政治不正确”的动员策略,引发了白人群

① 潘亚玲:《卷土重来:21世纪美国种族主义回潮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33页。

② Aaron Zitner, “America Pulls Back from Values That Once Defined It, WSJ-NORC Poll Finds Patriotism, Religion and Hard Work Hold Less Importanc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7, 2023, <https://www.wsj.com/articles/americans-pull-back-from-values-that-once-defined-u-s-wsj-norc-poll-finds-df8534cd>, 2023-12-26.

③ Megan Brenan, “Extreme Pride in being American Remains Near Record Low,” Gallup, June 29, 2023, <https://news.gallup.com/poll/507980/extreme-pride-american-remains-near-record-low.aspx>, 2023-12-26.

体的种族认同危机,以及保守派和右翼的焦虑与恐惧。随着美国政治极化的加剧,两党在教育领域的合作降低,矛盾和冲突日益显著,难以重现 20 世纪 60、70 年代团结共进的教育“黄金时代”。民主党拥抱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政府的主导和调控作用,提倡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而共和党倡导“保守主义”,主张减少政府对教育的干预,扩大父母的教育知情权,强调教师、家庭和管理者间协调关系的重要性。美国教育问题的政治根源复杂多元,包括选举政治的催化、两党政治博弈、联邦和州权的冲突、利益集团的推动以及最高法院转向保守等。两党在教育改革领域的“文化战争”,不仅剥夺了无数青少年接受公平教育和塑造正确人生观的机会,也侵蚀公立教育的质量和公信力,使公共教育很难起到兜底保障、社区治理、文化提升等作用。同时,教育领域的分歧和矛盾会威胁美国的地方教育质量,危害人才培养,并在宏观层面上加剧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削弱民众对国家身份的认同感。公立学校一直充当着美国社会的“过滤器”,将全球移民及其后代同化为认同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美国人”;同时也扮演着美国社会的“减震器”角色,在减少族裔文化分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政治极化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公立学校促进文化同化和减少族裔分歧的作用正在削弱。

总体而言,美国当下的教育问题已成为国内政党利益交织与矛盾对立的“宣泄口”。在政治极化不断加剧、经济通货膨胀与社会裂痕加深等深层次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弥合两党在教育领域的分歧将会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美国教育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值得继续观察和深思。